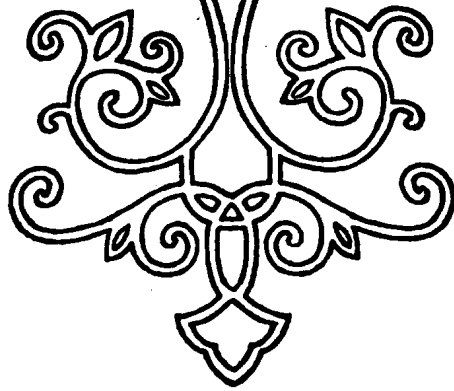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



# 三國演義

羅貫中著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九二年·北京

(京) 新登字 002 号

装帧设计: 李吉庆  
插图: 陈全胜

### 三 国 演 义

Sanguoyanyi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封面、插图北京新华彩印厂印刷

字数 687,000 开本  $787 \times 1092$  毫米  $\frac{1}{16}$  印张  $39\frac{3}{4}$  插页 17

1990年8月北京第1版 1992年12月北京第8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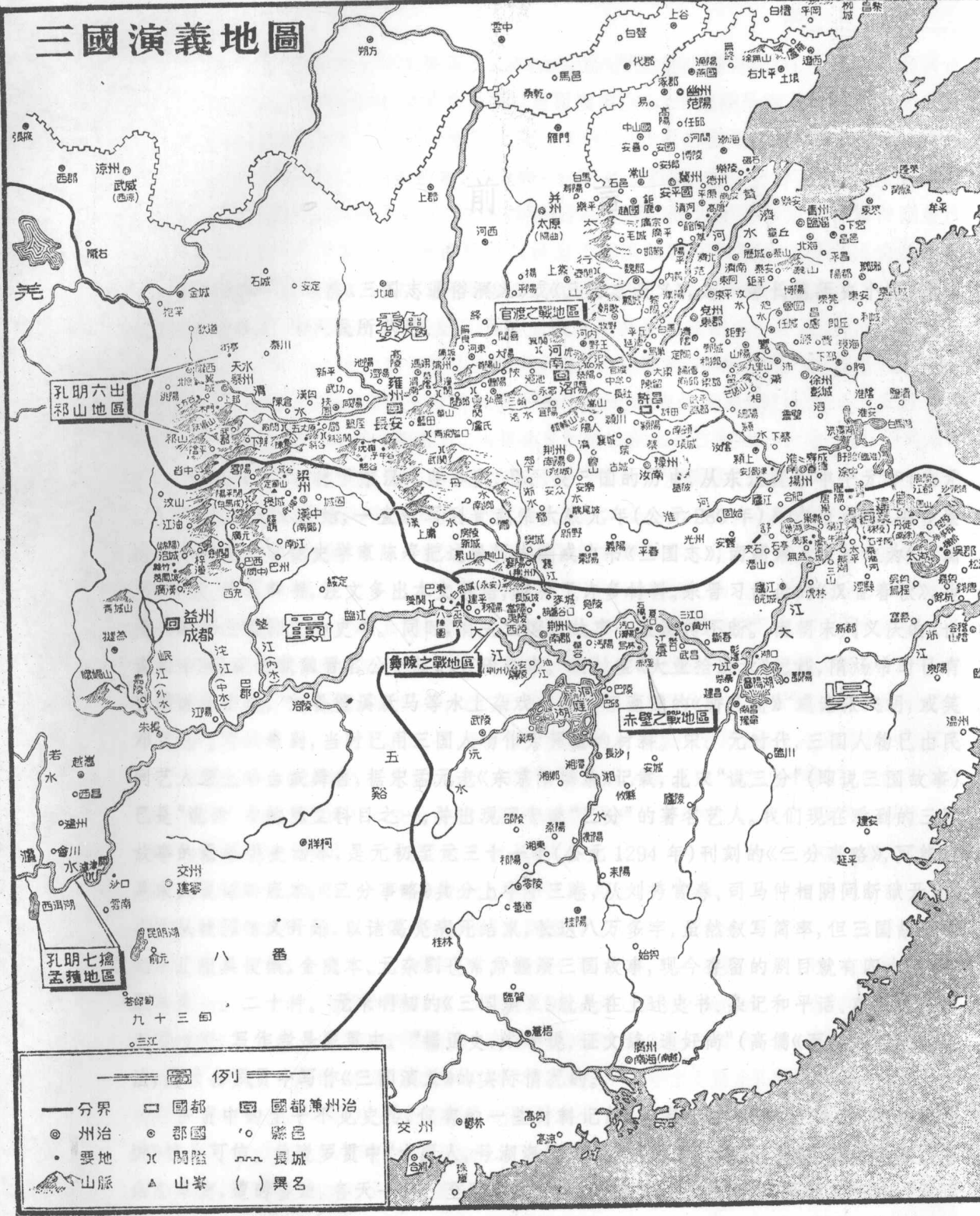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 27,801—50,800

---

ISBN 7-02-001006-7/I·967 定价 57.00 元



# 三國演義地圖



孔明六出祁山地區

官渡之戰地區

彝陵之戰地區

赤壁之戰地區

孔明七擒孟獲地區

九十三回  
三江

例

— 分界	□ 國都	◻ 國都兼州治
● 州治	⊙ 郡國	○ 縣邑
• 要地	⋈ 關隘	— 長城
▲ 山脈	▲ 山峯	( ) 異名

## 前 言

《三国演义》,也称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或《三国志演义》,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,流传广泛,影响很大,为人民所熟悉。

《三国演义》取材于东汉末年和魏、蜀、吴三国的历史,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(公元184年)黄巾起义开始,一直叙写到晋武帝太康元年(公元280年)吴亡为止,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。晋朝史学家陈寿把这段历史编成史书《三国志》,南朝宋人裴松之为《三国志》作注,博引群书,注文多出本文数倍,增补了许多材料。东晋习凿齿的《汉晋春秋》,也是一本写三国历史的史书。同时,有关三国的故事一直流传不断。南朝宋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》着重记载魏晋名公士族的言谈轶事。据杜宝《大业拾遗录》记载,隋炀帝时已有曹瞒灏水击蛟、刘备檀溪跃马等水上杂戏。唐朝李商隐的《骄儿诗》“或谑张飞胡,或笑邓艾吃”,可以看到,当时已用三国人物作为笑谑的材料。宋、元时代,三国人物已由民间艺人带上讲台或舞台,据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,北宋“说三分”(即说三国故事)已是“说话”中的独立科目之一,并出现了专说“三分”的著名艺人。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国故事的最早讲史话本,是元初至元三十一年(公元1294年)刊刻的《三分事略》,可能就是宋人说话的底本。《三分事略》共分上中下三卷,从刘秀赏春、司马仲相阴间断狱开篇;正文从桃园结义开始,以诸葛亮病死结束,长达八万多字,虽然叙写简率,但三国故事的始末已粗具梗概。金院本、元杂剧也常常搬演三国故事,现今存留的剧目就有四十多种,剧本有一、二十种。元末明初的《三国演义》就是在上述史书、杂记和平话、戏曲的基础上写成的,写作者是罗贯中。“据正史,采小说,证文辞,通好尚”(高儒《百川书志》)的说法,是符合罗贯中写作《三国演义》的实际情况的。

罗贯中的生平不见史传,仅有的一些材料记载,多有参差,其中贾仲明《录鬼簿续编》较为可信。他说罗贯中“太原人,号湖海散人。与人寡合。乐府、隐语,极为清新。与余忘年交,遭时多故,各天一。至正甲辰复会,别来又六十余年,竟不知其所终。”至正甲辰是公元一三六四年,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,大约在一三三〇到一四〇〇年间。他

所写的小说很多，相传有数十种，现在留存的，除《三国演义》外，还有《隋唐志传》、《残唐五代史演传》和《三遂平妖传》等。他亦能词曲。所作的杂剧，除现存的《赵太祖龙虎风云会》以外，尚有《忠正孝子连环谏》、《三平章死哭蜚虎子》等二种。罗贯中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大动乱，他接近社会下层，目睹当时现实斗争，对人民苦难深重的生活处境有所了解，对他们的理想追求也有所认识。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，他不可能提出取代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任何设想。从罗贯中所写几种小说的思想倾向看，他推崇“忠”“义”，主张用“王道”“仁政”治理天下。罗贯中一定程度上看到社会动乱的某种政治因素，但他所持的态度是错误的，他从根本上否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。他这种政治主张不仅表现在《三国演义》里，在《隋唐志传》和《三遂平妖传》里也有明显反映。

现在可以见到的《三国演义》的最早本子，是明弘治甲寅（公元1494年）序、嘉靖壬午（公元1522年）刊刻的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。全书二十四卷，分二百四十则，题“晋平阳侯陈寿史传，后学罗本贯中编次”。至于这个刻本与罗贯中原本之间，内容上有无不同，现在没有资料可供说明。在这以后，《三国演义》刊本越来越多，现在可见的明末刊本就有二十多种，说明流传很广。有的刊本除了加上总评、回评、眉批、夹批外，内容上几乎是相同的。

清朝初年，毛纶（字声山）、毛宗岗（字序始）父子，假托“古本”，对《三国演义》重新加以修订，并逐回评论。他们在修订中，进一步突出以蜀汉为正统，明确指出，把曹魏定为正统是错误的，而采用朱熹在《通鉴纲目》里关于蜀汉是正统的说法，声称“余故折衷于紫阳《纲目》，而特于《演义》中附正之。”（《读三国志法》）其次，是推崇关羽，认为关羽“报主之志坚”，“酬恩之义重”，“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”（《读三国志法》）。毛纶、毛宗岗如此修订《三国演义》，使得封建正统思想和封建礼教观念更加浓厚。清朝统治者很看重《三国演义》，曾派人同《四书》一起译成满文，并对作为“忠”“义”化身的关羽大加吹捧；同时，为了鼓吹封建伦理观念以维护封建统治，清代统治者还大肆宣扬封建正统观念，他们以标榜“为明复仇”为号召，修建朱明陵园，自居于继明的“正统”。毛氏父子的修订，跟清代统治阶级的观点是正相符合的。此外，毛纶、毛宗岗对文字情节也作了不少改动，如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里所说：“凡所改定，就其序例可见，约举大端，则一曰改，……二曰增，……三曰削，……。其余小节，则一者整顿回目，二者修正文辞，三者削除论赞，四者增删琐事，五者改换诗文而已。”这种修饰加工工作，改变了原本若干松散拖沓的地方，使全书更加紧凑畅达，成为《三国演义》广泛流传的一种本子。毛纶、毛宗岗修订的《三国演义》刊行之后，至今又约三百年了，内容上没有什么大变动。

《三国演义》写作的演变过程，有值得注意的两个特点：第一，它是在集体创作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。作者有民间艺人，也有封建文人，他们的政治、艺术观点和创作意图各

有差别,在漫长时期的传说和口头、书面的艺术创作里,集纳和熔铸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内容,所以《三国演义》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思想倾向。第二,它是一部历史小说。三国的人物故事久已流传,为人们所熟悉,这就使创作活动受到某种制约,即不能完全无视原有的三国人物和故事。然而,作者虽不能全盘改变原有的人物和情节,却可以根据自己世界观来决定取舍,有意识地突出或删去某些方面,进行艺术虚构,利用各种艺术手段来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,等等。所以,《三国演义》并不是简单地复述三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,而是一部经过艺术构思和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。它一定程度地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关系和生活面貌;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某些罪恶;提供了认识封建统治阶级军事斗争的部分材料;并塑造出一些较有影响的人物形象,在艺术上颇具特色。在封建社会里,地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。封建文人编修的史书是为维护封建制度服务的,即使是民间的、或接近于民间的文艺,也经常受到地主阶级思想不同程度的侵蚀。因此,在民间流行的平话和戏曲,有的封建意识也相当浓。《三分事略》、金元戏曲中的三国戏,封建意识就十分明显。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从维护封建统治立场出发,不但承袭了“正史”和平话、戏曲中的一些封建意识,而且还根据当时封建统治的需要,某些方面有所强化,这应该引起注意。由此可知,《三国演义》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,它展示了三国的历史画卷,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,暴露他们凶残阴险的种种罪恶,在封建统治者残民以逞之下,不难看出广大人民遭受蹂躏的痛苦和不幸。另外《三国演义》在鼓吹实施“王道”“仁政”的同时,歌颂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,反对农民革命;鼓吹“英雄”史观、神权思想和封建迷信;提倡封建道德,特别宣扬“忠”“义”等。因此,我们一定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“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,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”的教导,有批判地阅读《三国演义》,把这部小说当作了解我国古代历史的一种思想材料。

魏代

曹操

## 二

这个《三国演义》反映了公元三世纪前后黄巾起义与被镇压的过程,广泛而具体地描写了魏、蜀、吴等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,反映了当时某些历史情况。

东汉末年是个土地兼并剧烈、地主剥削残酷、官府徭役繁重、政治腐败不堪的黑暗时代。哪里有压迫,哪里就有反抗。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,迫使农民以武装斗争来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。一场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——黄巾起义,终于在公元一八四年象一声霹雳,猛烈地爆发了。黄巾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,动摇了它的基础,直接威胁着东汉王朝的生存。地主阶级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,对黄

### 三 国 演 义

巾起义军进行疯狂屠杀。黄巾起义军虽然在血腥镇压下失败了，但罪恶的东汉王朝也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，无法再维持对全国的统治。地主阶级内部各派武装集团在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基础上，不择手段地发展势力，扩大地盘，他们之间面临着一场为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的血腥斗争。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大小地主武装，为了取代东汉王朝，攫取财产和权力，进行了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和频繁的军事混战。《三国演义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情况。我们可以看到：“四方百姓，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”，声势浩大，“官军望风而靡”，在这种火烧眉睫的情况下，封建统治者一面“火速降诏，令各处备御”（第一回），负隅顽抗；一面调兵遣将，向黄巾起义军反扑过来。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搜罗了大批地主阶级的地方武装，配合“官军”围攻起义军。原先相互争斗着的统治阶级内部各政治派别和军事集团，在维护地主阶级政权的共同目标上，又相互勾结起来，采取联合行动，对起义军进行疯狂镇压。当农民革命归于失败后，官僚豪强间又重新进行混战。汉灵帝死，少帝刘辩继位，何进掌权，宦官杀何进，袁绍又起兵杀宦官，董卓赶走袁绍，后来又废刘辩而立献帝刘协。各有野心的官僚豪强，朝野呼应，反对董卓。王允设计杀死董卓，而董卓的部属李傕、郭汜之辈又大杀王允和其他官僚。以袁绍为首的十七镇诸侯，以讨伐董卓为名义，先后割据一方，混战互杀。从镇压黄巾起义中起家的曹操、刘备和孙坚，在多次战争中，一步步扩大势力。曹操自“移驾幸许都”后，使用汉献帝名义发号施令，经过十一年的长期角逐，基本上统一黄河流域，成了割据中原地带的大军阀。赤壁大战以后，决定了曹操、刘备、孙权三国分立的形势。此后，三国之间又混战了七十二年，全国才得到统一。这些大小豪强、军阀，正象鲁迅所描绘的：“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，可以肥己时就肥己，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，可以称尊处就称尊。”（《南腔北调集·沙》）他们为了争夺统治权，今天这几个集团聚集在一起，明天又破裂了；今天那几个集团势不两立地互相混战，明天又杯酒言欢了。《三国演义》有关这种情况的描写，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，争权夺利的斗争是永无休止的。这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。因此，《三国演义》的这种描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封建社会的历史，而且对认识剥削阶级的实质也有所帮助。

《三国演义》在反映这些政治军事集团争权夺利的尖锐斗争时，还描写了一个个政治骗局，一幅幅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的场景。第七十八回写孙权劝曹操做皇帝，就是一个例子。孙权这独霸一方的大豪强，是早在做皇帝梦的野心家。但当他杀了关羽，吴、蜀联盟破裂，形势不利时，就遣使上书曹操，“伏望”曹操“早正大位，遣将剿灭刘备”，自己愿意“率群下纳土归降”。孙权这种做法是圈套，企图让曹操和刘备之间发生战争，同时，使拥汉派进一步反对曹操，所以这正是陷害曹操的一种手段，正如曹操所说“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！”又如第一百六回、一百七回，司马懿夺取曹爽兵权前，以“衰老病笃，死在



丑夕”及其他种种假象麻痹曹爽，使曹爽感到“吾无忧矣！”然后发动突然袭击，一下致曹爽登时毙命。诸如此类的阴谋诡计，在《三国演义》中是屡见不鲜的。其实，这些也正是剥削阶级一贯使用的手法，他们不仅用来对付人民群众，而且也用来对付本阶级的政敌，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本质所决定的。因此，《三国演义》的这些描写，对于我们了解剥削阶级的狡诈手段，识破他们的阴谋诡计，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。

这些大小豪强、军阀，两手都沾满被压迫人民的鲜血，一次次争权夺利的混战，带给人民的真是无穷无尽的灾难。如写董卓：“尝引军出城，行到阳城地方，时当二月，村民社赛，男女皆集。卓命军士围住，尽皆杀之，掠妇女财物，装载车上，悬头千余颗于车下，连车带马，扬言杀贼大胜而回。”（第四回）董卓由洛阳西迁长安，临行大肆烧掠，使洛阳内城外三百里，并无鸡犬人烟”。既行，“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，前赴长安。每百姓一队，官军一队，互相拖押；死于沟壑者，不可胜数。又纵军士淫人妻女，夺人粮食；啼哭之声，震动天地。如有行得迟者，背后三千军催督，军手执白刃，于路杀人。”（第六回）董卓是这帮其他豪强、军阀也何尝不如此！“吾为天下计，岂惜小民哉！”（第六回）最能说明他们共同的阶级立场。当时，社会生产力遭受空前破坏，人民大量被屠杀，地主和农民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。人民生活在饥寒交迫、水深火热之中，“百姓皆食枣菜，饿草遍野”（第十三回），而以董卓之流为代表的地主阶级，则过着奢侈豪华、纵欲无度的生活，“别筑郿坞”，“内盖宫室，仓库屯积二十年粮食；选民间少年美女八百人实其中，金玉、彩帛、珍珠堆积不知其数”（第八回），形成两个阶级鲜明的对比。这些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是以残杀人民来建立他们的反动专制统治，以人民群众的血泪和尸骨来维护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的。

然而，作者描写这一切的主要目的，并不是为了揭露封建统治的罪恶，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用来歌颂“王道”的一种陪衬。所以，他在批判董卓等人的同时，却又通过其“正面”人物来赞扬、美化封建统治阶级，大肆宣扬“王道”。

为了欺骗人民群众，地主阶级一直极力鼓吹“王道”。他们说，“王道”是封建统治的“正道”，实行“王道”的封建统治者是“宽仁爱民”的，人民对这样的统治者则“心悦诚服”。《三国演义》把刘备美化成一个“仁慈”的、备受人民“爱戴”的统治者，也正是把他作为“王道”的化身来进行歌颂的。在写刘备从新野、樊城撤退的那些章节里，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在作者笔下，刘备对人民群众何等关心，为了人民群众，他竟然把自己的安危都置于度外了；至于人民群众对于刘备，更是竭诚“爱戴”，宁可死去，也不愿离开刘备。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刘备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，不但没有丝毫的矛盾对立，而且简直到了共命运、同休戚的地步。这种描写，企图使人们去憧憬刘备这样的施行“王道”政治的封建统治者。但在实际生活中，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群众不可能会出现这种鱼水般的融

### 三 国 演 义

洽关系；历史上，也没有存在过这种情况。
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《三国演义》通过刘备鼓吹“王道”的同时，还把他写成封建王朝的“正统”代表。在汉献帝做皇帝的时候，刘备对汉献帝忠心耿耿，他看到“朝廷陵替，纲纪崩摧，群雄乱国，恶党欺君”，悲愤得“心胆俱裂”（第三十七回），决心“伸大义于天下”（第三十八回），为重整汉王朝而奋斗。当汉献帝被废以后，刘备在四川做了皇帝，以继汉统，作者就把蜀汉作为三国的“正统”。而对于董卓、曹操之流，作品则一再斥责他们为违反“纲纪”、破坏“正统”的“乱臣贼子”，所谓“名虽汉相，实为汉贼”。这就是说，封建王朝的“正统”、封建制度（即所谓“纲纪”）的忠实维护者，就是“仁慈爱民”、实行“王道”的人，而人民的灾难，则是由“乱臣贼子”破坏封建“纲纪”所造成的；所以就封建统治的本质来说，是保护人民、跟人民利益相一致的。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，《三国演义》作者批判董卓、曹操等人物，跟他的歌颂“正统”、鼓吹“王道”一样，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。

也正是从这种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，《三国演义》对农民革命直接进行了诬蔑。小说所写的黄巾军，是汉末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运动。毛泽东同志在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》中深刻指出：“在中国封建社会里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、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，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。”但作者却一再诬蔑他们是“黄巾贼”，并通过小说中所谓“正面”人物之口，公然主张把农民起义军斩尽杀绝，“今海内一统，惟黄巾造反；若容其降，无以劝善”（第二回），反对农民革命的态度，十分坚决，十分鲜明。但在这里，却也就同时暴露了“王道”的虚伪性。正如鲁迅所指出，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，“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”（《且介亭杂文·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》）。封建统治阶级吹嘘的什么“仁慈爱民”、“广布恩德”，全都不过是欺骗人民、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虚伪口号，在这些口号的背后，是对人民群众极端残酷的屠杀和迫害。大肆宣扬“王道”“仁政”的《三国演义》，同时却又公然主张把起义人民斩尽杀绝，这也就有力地说明了作者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。

总之，《三国演义》虽然为我们提供了若干对于封建社会的历史具有认识意义的材料，但也宣扬了错误的有害的封建思想。所以，我们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进行分析批判，剔除它的封建性糟粕，明确认识作品所歌颂的“王道”、“仁政”完全是不真实的。封建社会真正代表地主阶级和体现封建统治者意愿的，不是那一类实现所谓“王道”“仁政”的“仁君”，而是另一类残民以逞的所谓“乱臣贼子”。

### 三

“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。”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真

理。然而，剥削阶级却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事实，把历史说成是少数剥削阶级的“英雄”人物所创造的，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也同样如此。作品所着重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——刘备和曹操，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对立的人物，如刘备告诉庞统所说：“操以急，吾以宽；操以暴，吾以仁；操以谲，吾以忠；每与操相反。”（第六十回）作者正以强烈的“拥刘反曹”的政治倾向，描写在同一事件上曹、刘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，这种描写充满全书。然而，无论是赞扬还是鞭笞，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，作者都宣扬了“英雄”史观。

《三国演义》把刘备描写为一个理想化的统治者、施行“王道”“仁政”的代表，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，被大量虚声美词掩盖着。《三国演义》否定黄巾起义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，而那些残酷镇压黄巾起义、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封建统治者，却被当作历史的创造者来吹捧。在陶谦把徐州让给刘备而刘备固辞不受时，作者安排了这样的情节：“次日，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：‘刘使君若不领此郡，我等皆不能安生矣！’”（第十二回）在刘备军队于博望坡大破曹兵，“班师回新野”时，作者又安排了这样的情节：“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，曰：‘吾属生全，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！’”（第三十九回）在这种颠倒历史的描写中，封建统治者刘备就成了救世主。为了表现刘备如何受到人民拥护，竟写了猎人刘安杀妻献肉这样的情节。刘备兵败徐州时，人民“皆争进饮食”，猎户刘安“欲寻野味供食，一时不能得，乃杀其妻以食之”（第十九回）。这种不真实的对地主阶级的吹捧，加重了刘备形象的虚伪性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指出：“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”，是最切当的批评。作为刘备对立面的曹操，却是《三国演义》描写相当突出的人物。

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诗人，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，对统一我国北方，曾起过相当的作用。《三国演义》没有肯定这些作用，把他作为破坏“正统”、违反“纲纪”的乱世奸雄来否定，反映了作者儒家的政治观点，“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”（鲁迅：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）。然而，《三国演义》在曹操的形象中，却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、狡诈的特点，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。

曹操也是农民起义的死敌，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刽子手，他在豪强大混战的过程中，一步步扩大势力，最后取得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地位和权势。曹操的人生哲学是“宁教我负天下人，休教天下人负我”，这是剥削阶级处世哲学的集中和概括。曹操具有极端的损人利己的特性，具有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，曹操身上，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全部恶劣品质。对于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，《三国演义》是通过丰富具体的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写，把他突现出来的。在他身上，具有多方面的复杂的性格特征。作为一个群雄割据的强者、胜利者，在风云突变的年代，曹操能认识各个集团的长处和弱点，了解事变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，善于发现人才、使用人才等，反面人物曹操，没有被写成浅显的、一眼可以看穿的坏蛋。在他身上，狡诈和残暴得到特别深刻的表现。如上所述，曹操

有谋略，也有才干，但他的所谓“谋略”和“才干”是为他的极端的唯我主义服务的，因此，“谋略”使他更狡诈，“才干”使他更残暴。曹操出于恐惧猜忌，杀了吕伯奢一家；因为要引诱吕布，却将掳来的群众当炮灰；为了报父仇，在攻打徐州时，军队所到之处“杀戮人民，发掘坟墓”（第十回），真是坏事干尽。然而，他又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好人，常常用假仁假义和小恩小惠来洗涤沾满两手的鲜血。他打着汉献帝的旗帜发号施令，北讨南伐，明明是发展自己政治、军事势力，取代刘汉王朝，却标榜为“与国家除凶去害”、“拯救黎民”；明明是自己下令克扣军粮，却借仓官的头来安定军心；为了防范行刺，杀死侍者而佯装不知；表示军法严明，还要出“割发权代首”的把戏。如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

很清楚，作者对曹操是持否定态度的。然而，是英雄创造历史，还是人民创造历史？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都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，《三国演义》作者以为曹操既是“乱臣贼子”，但又是人类历史和人民群众命运的主宰者，征张绣时，命令军士不准践踏麦田，“百姓闻谕，无不欢喜称颂，望尘遮道而拜。”（第十七回）在曹操跟刘备一起消灭吕布以后，“百姓焚香遮道，请留刘使君为牧。操曰：‘刘使君功大，且待面君封爵，回来未迟。’百姓叩谢。”（第二十回）总之，在刘备面前也好，在曹操面前也好，人民群众都只有哀求、叩拜的份儿，他们被作者歪曲成了毫无作为的“群氓”，而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——无论是“汉贼”还是“皇叔”，都被吹捧成了掌握人民命运、支配历史进程的“英雄”。尽管作者对刘备和曹操的褒贬非常明显，但这两个人物的塑造，却共同反映出作者的英雄史观。

与此同时，《三国演义》还大肆吹嘘这些封建统治者的天赋才能，把他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，归因于他们的“天赋”。如写刘备，说他生下来注定要成为“贵人”，从小就有“大志”，与众不同，“非常人也”（第一回）。写曹操，则说他幼时就“有权谋，多机变”，从小就是“安天下”的“命世之才”（第一回）。并在《邙中歌》里评论曹操说：“邙则邙城水漳水，定有异人从此起。”“英雄未有俗胸中，出没岂随人眼底？”“文章有神霸有气，岂能苟尔化为群？”“安有斯人不作逆，小不为霸大不王？”（第七十八回）进一步把他写成山川灵气所钟、超群出众的“异人”。总之，在作者笔下，这些主宰历史、驱策人民的“英雄”，都是“天生”的超人。

《三国演义》还借助“天命”来颂扬作者理想的“英雄”。据作者说，这些“英雄”人物之所以降生到世上来创造历史，统治人民，全都是执行上天的意旨，所谓“受命于天”。曹魏之所以破灭豪强，统一北方，固然是“天命”；刘备之终于做了皇帝，也是“天命有归”（第三十五回）。因此，这些“应天而生”的封建统治者是受上天保护的。第三十四、五回，写蔡瑁要害刘备，但由于“天意”、“神助”，刘备所骑的马竟然“一跃三丈”，使他脱离了险地。第四十九、五十回，写曹操在华容道之所以大难不死，是“天象”所定，“未合身亡”。书中还一再声称“顺天者逸，逆天者劳”，“逆天而行，乃自取败亡也”（第三十七回、一百二

回)。因此凡成王称帝者，总有“凤凰来仪”“黄龙屡现”的征象，而每一重要将帅战死，都有“帅旗忽折”“将星流堕”的预兆。作者宣扬这种“天命”思想，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。在封建社会里，“政权、族权、神权、夫权，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，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。”（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）《三国演义》的这种描写，就正是利用神权思想为封建政权服务，要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这些被吹捧为“天生”“超人”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统治；并警告人们说，谁要敢于起来反抗，就是逆天行事，自取灭亡。这也就进一步暴露了，“英雄”史观到最后总是不得不乞灵于“天命”之类的唯心主义的幽灵。

#### 四

《三国演义》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、影响深远的艺术形象。这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形象，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，并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作者的社会、政治思想。除上文提及的曹操等人物外，还有：郭嘉、夏侯惇、黄盖、吕蒙、张飞、赵云、黄忠等等，其中尤以诸葛亮描绘得最为突出。

诸葛亮在作品中，是被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歌颂的，作者对他倾注了强烈的爱和崇敬，把他作为“忠贞”和“智慧”的化身，特别对诸葛亮的“智慧”，更是用尽笔力，大肆渲染。

马克思主义深刻指出：认识来源于实践。从历史事实来看，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，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敏锐、处事比较有胆识有谋略、能随机应变的人，他具有这些长处，原因之一，是因为他重视实践。例如，在曹操取得荆州、领兵南下时，诸葛亮曾向孙权分析当时形势，预计到曹操必败，就正是因为诸葛亮已经在曹操下荆州的过程中，经历过战争的实践，对敌我双方的长处和弱点都已作了比较的缘故（见《三国志·先主传》和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）。而就《三国演义》看，在有些章节中，作者写到诸葛亮之所以取胜，是由于他对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查、分析的结果。如在有几次战争中，诸葛亮事先实地观察地形，调查对方兵力部署，根据地形和客观实际情况，制定了有利的作战方案，击败了敌人。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用“空城计”，就是因为他对敌方将领的情况作了分析，知道司马懿了解自己“生平谨慎，必不弄险”（第九十五回），从而利用司马懿对自己长期形成的认识，采用了十分“弄险”的疑兵之计，解除了危机。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，诸葛亮的正确判断，是在他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。然而，在更多的章节里，作者却把诸葛亮写成了“先知先觉”的人物，宣传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。

诸葛亮一出场，他就告诉刘备：“亮夜观天象，刘表不久人世。”（第三十八回）诸葛亮



病重在五丈原，“自于帐中祈禳北斗。若七日之内主灯不灭，吾寿可增一纪；如灯灭，吾必死矣”。结果魏延飞步入告军情，“竟将主灯扑灭”（第一百三回），真个能“知凶定吉，断死言生”。为了突出诸葛亮，作品还一再写他的“锦囊妙计”，每逢重要事件，他总要把装有“妙计”的锦囊交给执行任务的人，吩咐“到时开看”，不但根本不跟别人商量，而且也不让执行任务的人事先知道事情如何去做。一切都只是他那种能够“先知”的“智慧”在起作用，其余的人都只是被他的“智慧”所驱策的、被动的工具。至于“七星坛祭风”里，写诸葛亮登坛作法、呼风唤雨等，更是荒诞不经的描写。类似这样的问题，还可以在“巧布八阵图”、“班师祭泸水”、“五丈原禳星”、“定军山显圣”中看到。鲁迅批评《三国演义》“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”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，是极其确切的评价。俗语说：“三个臭皮匠，合成一个诸葛亮”，也正说明了诸葛亮不是超凡的“先知”、不可企及的“天才”。最富于斗争实践的是人民群众，人民群众具有无限的聪明才智，诸葛亮形象的塑造，概括了集体的智慧和才能。

对于诸葛亮的所谓“忠贞”方面，小说也给以多方面的描写。诸葛亮忠于刘备，刘备死后，继续尽忠于阿斗（刘禅），为了报答“三顾草庐”和“临终托孤”的知遇之恩，他“亲理细事，汗流终日”，以至于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（第一百三回、九十七回）。诸葛亮“忠贞”的出发点，既有封建的“正统”观念，也有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“义”的思想。在三国鼎立的形势下，小说描写了成批的谋臣策士，诸葛亮也是其中一员。属于知识阶层的这支队伍，尽管他们的思想、才能、性格各有不同，但都从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出发，以个人恩怨依附于某一个政治集团，与某一个统治主建立君主臣属关系；有时用兄弟、朋友等形式来表现这种关系，但并没有改变阶级关系的实质。因此，作为蜀国“贤相”的诸葛亮，他是矢志忠于刘氏天下的。然而，诸葛亮的形象，又不是用封建主义的“愚忠”所能完全概括。作者通过刻划他的所谓“谨慎”、“谦逊”、“严于律己”等个人品质，通过一系列经过美化的“清明”政治措施，来突出这一形象，把他塑造成封建社会“完人”的典型。在社会动乱、政治黑暗的年代里，作者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杰出的政治家，盼望由他们来实施“王道”和“仁政”。

关羽也是《三国演义》着力描写的人物，作者精心刻划他“神威勇武”的一面，在众多的战将中，他出类拔萃的气概最为突出。“温酒斩华雄”、“诛颜良、文丑”表现他万人敌的“勇武”，“临江会”、“单刀会”突出他凛然不可犯的“神威”，“刮骨疗毒”写他沉着的“大丈夫”气概。总之，作者力图通过许多夸张传神的描绘，使关羽成为一个“英雄”人物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指出的“惟于关羽，特多好语”，也是指他的“丰采”和“勇力”而言的。

《三国演义》如此美化关羽，完全是为提倡封建的“忠”“义”思想。在关羽身上，“忠”

和义是结合在一起的。关羽之与刘备、张飞“桃园结义”，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。他们“黄巾倡‘乱’，有志欲破‘贼’安民”，所以“结为兄弟”，以便“同心协力”地“上报国家，下安黎庶”；并发誓说，决不“背义忘恩”（第一回）。这就清楚说明了，他们所标榜的“义”，是以反对农民起义、维护封建统治作为首要内容的，阶级性十分鲜明。然而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尖锐，刘、关、张“桃园结义”以后，不但共同镇压了黄巾起义，而且“尊刘抑曹”为旗帜，跟地主阶级内部其他派系进行了你争我夺的斗争。在这些斗争中，关羽“义不降心，忠不顾死”，“披肝沥胆”，效忠刘备，最终为刘备而“断首捐躯”。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对此十分赞赏，称许他为“天日心如镜，《春秋》义薄云”（第七十七回）。由于《三国演义》大肆吹捧关羽的“忠”“义”，不过是要人们效法关羽，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，为某一个封建主卖命而已。

正因如此，关羽也就为地主阶级所特别重视。在陈寿的《三国志》中，关羽的地位，不亚于张飞、赵云相等。宋、元的统治阶级虽已先后尊关羽为“真君”和“武安王”，但就吹捧的程度和规模来说，都远远不及明、清两代。自从《三国演义》把关羽写成“忠”“义”的化身以后，他就成为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理想的人物，随着《三国演义》的传播，关羽在民间的影响就越来越广。明、清的统治阶级曾几次封他为“大帝”，到处为他立庙，享受着像孔丘同样隆重的祭礼。这就清楚地说明，通过关羽鼓吹“忠”“义”的这种描写，是多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。

也是为了提倡给封建主子卖命，《三国演义》还塑造了一系列所谓“忠臣”形象，如董承、王子服、吉平等，他们为了尽忠汉献帝，诛除“国贼”曹操，“虽灭九族，亦无后悔”（第二十三回）。后来因事情败露，“全家老小”都被曹操所杀。作者对这些人极尽歌颂之能事，说他们“捐躯报圣明”，“千秋仰异名”；“忠贞千古在”，“誓死答君恩”。把这些人吹捧为流芳千古的模范人物。此外，在写姜维等人物时，鼓吹了封建的“孝道”，在写孙夫人等人物时，鼓吹了封建的“节烈”。由此可见，《三国演义》所塑造的人物形象，是贯穿了作者的社会、政治观点的。通过这些形象，作者宣扬了封建的“仁政”、“英雄”史观、唯心的先验论和封建道德等。因此，我们对于这些艺术形象，也必须首先认清其思想实质。

## 五

善于描写战争，提供封建社会战争的某些有价值的研究材料，是《三国演义》具有积极意义的又一个重要方面。

毛泽东同志在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一文中说：“战争——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、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、民族和民族、国家和国家、政治集团和政治

集团之间、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。”战争既然成为解决矛盾的最高的斗争形式，那么战争的胜负对于交战双方的得失存亡就有着决定的意义；研究和总结战争规律，以便认识和掌握这些规律，运用它去指导战争，取得斗争胜利，是军事科学发展的迫切要求，也是阶级社会矛盾和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。三国时期是一个战争频繁的年代，战争迫切要求发展军事理论，同时也为军事理论提供丰富的原料。《三国演义》写作的时代是在封建社会后期，离三国时期已一千多年，其间又经历了许多战争的实践，使总结战争规律的军事著作和描写战争的史传文学有了新的内容，作者吸取了这些方面的成果，并根据元末明初的战争的体会，特别擅长关于战争的描写。《三国演义》描写战争的成就是值得注意的，许多战略战术的运用，大体上符合军事科学的原则，而且还写了具有某些朴素的辩证法因素的事例，描写战争的艺术方法也是丰富多样的。

例如袁曹官渡之战，战争一开始，双方的力量对比、客观条件的优劣差别很大。袁绍起人马七十万，粮食充足，且具有地理上的有利形势；曹军只有七万，粮食将尽，地理上也不利。但由于曹军这一方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，利用和扩大袁军决策错误、军心涣散的弱点，集中优势兵力，袭击袁军屯粮之处，火烧粮草辎重，一战而胜，乘胜再下，各个击破，取得击溃和全歼主力的胜利。相反，袁绍主观指导错误，完全丧失较好的优势和主动地位，遭受失败。毛泽东同志在《论持久战》中指出：“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，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，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、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。”官渡之战强弱双方的转化，体现了在客观物质基础上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意义。

《三国演义》写吴蜀彝陵之战，吴军连败十余阵之后，陆逊下令不许迎战，即使蜀军在阵前“辱骂百端”，“解衣卸甲，赤身裸体，或睡或坐”，也坚守不出，采用战略退却的方针，促使蜀军向骄傲、焦躁、疲惫、松懈、轻敌方面转化，以至刘备“移营夹江，横占七百里，下四十余屯，皆依溪傍涧，林木茂盛之处”（第八十四回），造成吴军战略反攻的极好条件，结果刘备全军覆没。“有名的大战，都是双方强弱不同，弱者先让一步，后发制人，因而战胜的。”（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）退让一步，不是懦弱，目的是调动敌人，促使事物向有利于自己方面转化。战争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，都存在着相反相成的对立面，要研究攻守、进退、动静、劳逸、利害、得失等对立面转化的规律，认识和掌握这些规律，就能促成事物转化，可以胜利地指挥战争。

《三国演义》的战争描写，还注意分析矛盾的特殊性，用不同的战术解决不同的战役。《三国演义》写战争，不是千篇一律地写双方对阵，在作者笔下，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都千变万化、各有特色，反映了现实战争的矛盾特殊性，和解决矛盾的战略战术的多样性。“火烧赤壁”、“水淹七军”，一是火攻，一是水攻，采取两种不同战术，都是根据天时、

地形和特定的具体的战争条件决定的。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,做到“知己知彼”,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,解决不同的具体问题。诸葛亮“安居平五路”就是一个例子。曹丕发大兵五十万,五路并进,攻打蜀汉,引起全国震惊。由于诸葛亮善于具体地分析实际情况,了解每一路将领的才能、特点、地形的险要,以及他们内部的矛盾关系等等,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和措施,终于化险为夷。相反,如果不去研究矛盾各方面的特点,不是采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,其结果总是要把事情弄坏。《三国演义》曾塑造了一个军事教条主义者马谲的形象。马谲奉命去守街亭,他不是具体分析街亭的攻守形势、敌我情况,作出切合实际情况的战斗部署。却不用脑筋地背诵古兵法上的公式:“兵法云:‘凭高视下,势如劈竹’”,“孙子云:‘置之死地而后生’”,他照书本上的公式画瓢,作出违反实际情况的错误决定,结果街亭失守,破坏了全局的战略部署。

《三国演义》写战争运用的战略战术是丰富多样的,例如:从多种矛盾中找主要矛盾、战役的持久与速决、判断战况的假象与真象等等,都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。《三国演义》描写的战争是封建统治集团的战争,它不同于农民战争。战争从来就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分。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,有着两种不同的发展规律;某些战争规律具有普遍意义,但是不同阶级应用这些规律,却有着鲜明的阶级内容。《三国演义》在描写战争方面是有成就的,但是应该看到作者的鲜明倾向是:“将帅”决定战争的一切,“兵士”几乎是虚设的,人民更是毫无地位。这种颠倒历史的现象,是“英雄”史观的一种表现;有些情节,则反映出作者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观点。另外,《三国演义》虽然描写了某些具有辩证法因素的战争事例,但作者对于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规律,没有也不可能自觉的认识;只有用毛泽东思想进行分析,这些事例内在的唯物辩证法原则才能被人们所认识。

## 六

取材于历史,又不为历史事实所限制,是《三国演义》创作方法的一个特点。小说取材的来源已经指出过,它包含两方面:一类是历史书,象陈寿《三国志》和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等;一类是民间和文人关于三国故事的创作。鲁迅曾经指出创作《三国演义》处理题材的问题:“据正史即难于抒写,杂虚词复易滋混淆”(《中国小说史略》)。小说却比较妥善地解决了上述问题。在艺术创作的长期过程中,作者没有完全拘泥于历史事实,但也没有全部摒弃它,而是依据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现实,对历史题材有选择地加以取舍;吸取前人创作成果,通过艺术构思进行再创造,塑造出具有一定认识意义和艺术价值的人物。正如鲁迅所说:“艺术的真实,非即历史上的真实,我们是听到过的,因为后者须有其事,而创作则可以缀合、抒写,只要逼真,不必实有其事也。”(《鲁迅书简》第六〇五页)